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 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

——文献研究(上卷)

Переписка Сталина с Рузвельтом и Черчиллем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俄罗斯〕弗·奥·佩恰特诺夫 / 著
〔俄罗斯〕伊·爱·马加杰耶夫

于淑杰 隋 涛 赵春雷 / 等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 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

——文献研究(上卷)

Переписка Сталина с Рузвельтом и Черчиллем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俄罗斯] 弗·奥·佩恰特诺夫 / 著
[俄罗斯] 伊·爱·马加杰耶夫

于淑杰 隋 涛 赵春雷 / 等译

图字：01-2016-6208

Copyright 2015 by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Foreign Ministry of Russian Federati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World Affairs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oscow St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der Foreign Ministry of Russian Federation

书名原文：Переписка Сталина с Рузвельтом и Черчиллем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俄罗斯“奥尔马梅地亚集团”出版社于2015年首次出版俄文版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 /（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奥列戈维奇·佩恰特诺夫，（俄罗斯）伊斯坎德尔·爱德华多维奇·马加杰耶夫著；于淑杰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10

书名原文：Stalin's Correspondence with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ISBN 978-7-5012-5592-4

I. ①卫… II. ①弗… ②伊… ③于… III. ①斯大林著作—书信集—研究 ②罗斯福（Roosevelt Franklin Delano 1882-1945）—书信集 ③丘吉尔（Churchill,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1874-1965）—书信集 IV. ①A831.3 ②K837.127=5 ③K835.1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9827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袁路明

赵 玥

陈可望

田 林

书 名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上卷）

Weida Weiguo Zhanzheng Qijian Sidalin Yu Luosifu He Qiujier Wanglai Shuxin — Wenxian Yanjiu

作 者
译 者

〔俄罗斯〕弗·奥·佩恰特诺夫 伊 爱 马加杰耶夫

于淑杰 隋 涛 赵春雷 等

出版发行
地址邮编
网 址
电 话
经 销
印 刷
开本印张
字 数
版次印次
标准书号
定 价

世界知识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www.ishizhi.cn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新华书店

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710×1000毫米 1/16 37印张

612千字 63幅图

2017年11月第一版 201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012-5592-4

198.00元（上下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译校者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序)

翻译：于淑杰 王继昌 王银赛 孙 瑜
安宝龙 张 晶 罗 徽 赵春雷
高 云 韩 喆 隋 涛 谭丽华
校对：于淑杰 赵春雷 隋 涛
统校：于淑杰 赵春雷
审读：安宝龙 袁 杨

序 一

亲爱的朋友们：

在此，向你们推荐一本独特的学术出版物，即关于二战期间苏、美、英领导人往来书信的最新研究成果。

2015年，我们庆祝了对包括建立联合国在内的现代国际体系具有关键意义的伟大胜利70周年。

战争年代的联盟关系这一主题不仅持续引发历史学家们的关注，也令广大读者兴趣不减。有关残酷年代那些鲜为人知的事件的最新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俄联邦外交部对此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诚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萌发了出版联盟国家领导人往来书信的想法，并在7年后首次付诸实现，之后又多次在苏联国内外再版。但2015年出版的这两卷本著作是俄外交部所属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专家们集体创作的结晶。学者们对已经众所周知的事件做了大量的补充说明，补充的内容包括之前未解密的俄罗斯和外国军事外交档案材料，总计5000余份，并附有说明。这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和理解苏、美、英领导人在二战背景下的行为动机。

公开的文献再次证明，建立反希特勒联盟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当然，每位领导人都首先要捍卫本国的利益，同时，尽管有激烈的争吵，但为了共同的目标——早日取得胜利，他们还是能够超越私念、克服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我相信，在世界面临空前的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新挑战的今天，研究“三巨头”的合作经验具有特殊意义。二战的教训鲜活地证明，主要国际“玩家”为了寻找共同应对现代威胁的答案，必须开展集体外交工作，必须依靠国际法、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原则以及联合国的核心协调作用。

俄罗斯与中国在战争年代曾是盟友，承受了侵略国的主要打击，蒙受了

最惨重的损失。我们一致认为，必须与歪曲历史、企图让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现象作斗争。我们共同努力维护那些历史事件的真相，将有助于进一步巩固当前处于史上最好时期的双边关系。俄中伙伴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战略意义，是维护全球和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有助于形成世界秩序的多中心框架。

我希望此书能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



〔俄罗斯〕С.В.拉夫罗夫*

2016年9月

* С.В.拉夫罗夫，现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部长。

序 二

《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在中国翻译出版可喜可贺。该书作者是俄罗斯史学大家之一弗拉基米尔·佩恰特诺夫与其年轻的合作者伊斯坎德尔·马加杰耶夫。

1957年，“三巨头”的往来书信首次在苏联出版。此后，研究者们又接触到大量档案文件，发表了内容广泛的历史著作。这使得B.O.佩恰特诺夫和И.Э.马加杰耶夫能够在世界史的专著中，在汲取俄、英、美外交和军事档案丰富文献的基础上，对往来书信进行独到的研究。该著作使用了5000多份解密文件，其中有许多是首次引入学界。

作者借此做到了以下几点：第一，披露了书信的完成过程，评述了苏、美、英领导人对书信的个人贡献，而这项工作本身就使该著作充满了新意；第二，作者将书信的内容与信中所提到的现代史上世人皆知的事件和问题真相进行了比较；第三，作者将官方的往来书信与各方的真实动机和情绪进行了比较。这最后一点是研究政治史时（更遑论政治学了）非常重要的一点。

不能不指出的是，在英国提供的档案中，详细描述了丘吉尔及其身边人开诚布公的内部对话，在这方面，它们具有特别鲜明的代表性。最后，往来书信被放在了全球战争广阔的政治军事和军事战略背景之下。很显然，往来书信对解决下列具体问题作出了最直观、最直接的贡献，如按租赁法案提供援助物资、波兰问题、盟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协作、双边关系、与第三国的关系以及联盟会议和高层会晤的筹备等。引入新的档案文献对往来书信进行详细分析，使我们能够加深对“三巨头”之间人际关系的理解，人际关系在政治乃至国际关系中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伟大的联盟”，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称的那样，是世界政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就本质而言，三国领导人对共同进行战争的所有主要

问题和战后安排都进行过长期的谈判，谈判大约持续了将近五年。作者从内部再现了联盟面对随时可导致其瓦解的沟沟坎坎和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实际应变能力。每一次“三巨头”都能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就主要问题达成一致。尽管以苏联为一方，以盎格鲁-萨克逊为另一方的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矛盾尖锐，尽管双方政体迥异，但“三巨头”之间的密切协作进展顺利。

在书信往来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紧张时刻。例如1941年夏秋之际，即对苏联来说最困难的时期，苏联红军遭受了来自纳粹军队的一系列最惨重的打击。斯大林在1941年9月3日致丘吉尔的信中被迫写道，苏联被置于“致命的威胁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1941年6月，德国军队几乎是世界历史上最强大的、最有经验的军事机器。纳粹德国的武装力量拥有1939年对波兰作战和1940年对法国及其西方战场盟友作战大获全胜的经验，拥有高水平的军事技术装备、战役和战术理论。在这些战役中，德国军队成功地实现了“闪击战”战略。“闪击战”是当时那个历史时期的一场“军事革命”，但波兰、法国、英国和苏联都没有认识到。

苏联红军对打败德国军队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东方战场粉碎了德军优秀的兵团和军团。但通往胜利之路是漫长的和艰难的。为了取得胜利，苏联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努力。

盎格鲁-萨克逊盟友对苏联的援助早在1941年就开始了，但规模不大。1941年12月，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城下取得的巨大胜利几乎完全依靠的是自身的人力物力。美英根据租赁法案提供的援助物资直至很晚才开始发挥作用。本书指出，总的来说，这些援助得到了苏联领导人的高度赞赏。

俄罗斯清楚地记得并高度评价中国、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战胜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所作出的贡献。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军队英勇顽强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和占领者，是日本没有于1941年和1942年在远东和后贝加尔地区对苏联开展大规模战斗行动的重要因素。

В.О.佩恰特诺夫和И.Э.马加杰耶夫对往来书信进行的深入分析，立场鲜明地肯定了苏联在粉碎德国法西斯中的巨大作用和苏联在世界上享有的崇高威望，它不得不让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盟友——首先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心生敬佩。俄罗斯历史学者的新作不仅将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还将使广大的中国读者对苏、美、英在1941—1945年间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的各个层面都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本书是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完成的，对战争年代的伟人、军人和外交家做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刻画。希望该书在翻译成中文时能完整地保留这种语言风格。

〔俄罗斯〕A.A.科科申*

* A.A.科科申，曾任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现任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部院士秘书，莫斯科罗蒙诺索夫国立大学世界政治系主任。

序 三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战略协作和战争指导水平远胜于德、意、日轴心国。这主要归功于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的运筹帷幄，善于发挥幕僚和参谋机构的作用，指挥各自的军队进行战略协同作战，最终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斯大林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往来书信——文献研究》，充分反映了他们的战略思维、决策能力、性格特点和为战争胜利所作出的非凡贡献。他们是拼着一生的经验、才智与精力领导这场战争。他们是战争中的盟友，也是国家利益的竞争对手。其中相互的战略博弈、冲突与妥协，合作与猜疑，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构成生动的大历史画卷，而且为后人提供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关系最高层和最原始的素材，成为留给后世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汗牛充栋的二战史研究著作中，这本书无疑具有独特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的战略联盟对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单独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同盟国军队之间由于保密的缘故，各国参谋部不能建立固定的横向联系，其战略协同、支援与配合，主要靠最高领导人互通情报，反复磋商，协调行动，包括英美舰船穿越北海航线支援苏联作战问题，主要作战方向问题，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对波兰本土卢布林政府与驻英流亡政府的态度问题，意大利投降军舰分配问题，特别是确定德意日无条件投降的具体条款等大事，都是书信文电的重要内容。

各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及其变化决定在联盟中的主导地位。英国最早抗击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美国始终在东方和西方两个战场作战，并以强大的战争物资支援盟国。苏德战场是欧洲的主战场，苏联军民牺牲达2700万，损失最惨重，战果也最多，歼灭敌军人数占敌军损失总数的78%，对战争胜利贡献最大。斯大林格勒战役苏军大反攻和美英联军发起诺曼底登陆战役，是同

盟国合作最顺利、最紧密的时期，“三巨头”书信中出现“美好祝愿”和热情洋溢话语最多。

历史证明，国际同盟向来是盟而不同。在“三巨头”往来文电中，反映了各自强烈的国家利益观念。他们既为反法西斯共同目标苦心谋划，又为各自国家的利益而进行政治、外交和战略博弈。丘吉尔的战略企图始终围绕它原来的势力范围——非洲、地中海、希腊、巴尔干、罗马尼亚等，进行“小打小闹的战争”，“真正的、残酷的决战由俄国主导”（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评语）。斯大林实行的是传统地缘战略，沿周边扩展最大的战略纵深，即使在战争初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也强调战后苏联边界西扩到波兰的“寇松线”。罗斯福关注的是战后由美国掌控的世界，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联合国组织等，营造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意识形态和美元在金融商贸中的支配地位。越是接近胜利，三方的矛盾越是尖锐化，被掩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逐渐显现。围绕波兰建立新政权问题，苏联支持卢布林政府，英国支持流亡政府。美国单独在伯尔尼与德国代表接触，引起苏联极大的不满，甚至到了出言不逊的程度，被罗斯福称之为“极尽污辱的信函”。关于对日作战问题，美国不允许苏联进占北海道；苏联不让美国占领千岛群岛。丘吉尔甚至命令军方拟制对苏战争计划，遭到军方的反对而作罢。当然这些负面的作为，对于“三巨头”来说，应该用“不以一眚掩大德”的态度对待。他们忠实维护本国的利益，同时也无法避免各自的历史局限。他们在世界最大的战争考场上做出战略思维与战略决策的答卷，交由历史评判。

领袖人物个人的历练、性格、素养和思维特点在书信文电中跃然纸上。丘吉尔善弄文墨，讲求外交礼仪，带有贵族式的幽默和狡黠，并且成功地运用夫人外交。罗斯福宽容大度，善于协调国际关系，经营战后格局。雅尔塔会议，他以重病之躯，万里远行，移樽就教，两个月后辞世，可谓鞠躬尽瘁。斯大林坚毅深沉，不苟言笑，不玩客套，涉及苏联利益则锱铢必较、寸步不让，有时甚至表现粗鲁。由于苏德战场是欧洲主战场，苏军顽强抗击德军的大部分兵力的进攻，对欧洲战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斯大林有底气对待盟国。三次重要会议，即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都是按斯大林的意愿在苏联占领区召开的。因斯大林不同意中国领导人参加，而不得不另行召开美英中“开罗会议”。所有公告内容也最大限度满足苏联的要求。

智者千虑总有一失。战略思维必须周延，不能留有空隙。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四大国会议，讨论联合国组织构成，苏联提出它的16个加盟共和国

都作为一方加入，以便多占席位（后来减为3个）。理由是“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外交部，有脱离联盟的权利”。这是留有后患空子的战略决策。当中央集权强有力的时候，加盟共和国可以独立的条款没有实质意义；当中央集权衰弱的时候，便赋予分裂以合法性。假如斯大林在他极盛时期改变加盟共和国体制，变为行政州，至少可以消除日后各加盟共和国独立、导致苏联解体的法理依据，或为未来留下可以操作的空间。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讲求春秋笔法，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戒律。战争是残酷而复杂的，特别是当国家利益与历史积怨、民族纠纷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性质会发生扭曲。“卡廷事件”就是这样。战争初期斯大林下令在卡廷森林和其他三处枪决近2.2万名波兰战俘和公务员、知识分子。这个惨案明显严重违背1929年日内瓦公约第二条款，是同盟国正义战争中唯一不具备正义性质的大事件。不管苏联与波兰之间有多少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等客观因素，都无法为之辩解。但是在当时对敌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情况下，苏联只能予以坚决否认。美英两国也许心知肚明，为了反法西斯战争大局，不得不保持沉默，甚至帮助苏联压制波兰流亡政府的指控。但历史无情，几十年后“苏东波”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正是从波兰开始的，苏联的解体也是从苏联在二战之初占领的波罗的海三个小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开头的。二战中令人遗憾的事件还不止此，如英国在中国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却配合日本军队封锁滇缅公路，断绝中国外援通道。苏联与日本签订《日苏中立条约》，罔顾中国主权，承认伪满洲国和外蒙古独立。美军为求政治影响而不顾战役协同，放弃配合英军围歼德国重兵集团，单独抢先占领罗马。英国派兵镇压已经解放雅典的希腊民族解放军，扶持国王乔治二世复辟君主制。凡此种种，都在历史上留下负面的影响。

历史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不同。历史著作的真正成果，都是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历史是反思，哲学是反思的反思。事物的因果性与必然性相联系，就是“一个运动是另一个运动的原因”。罗斯福在书信中曾留下警告：“时代教会我们，任何一群人无论何时都不可能强大到可以控制整个世界。”但“三巨头”的几代继任者都没有遵守这条戒律。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角度审视二战的后续效应，就是建构了战后世界美苏争霸的新格局和冷战的开启。不论当初他们有意还是无意，都避免不了这个历史运动的命定规律。二战后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持续不断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都受之于二战的历史遗产。

毫无疑问，在战争中领导人的智慧、谋略、胆识和威望起着重大作用，但整体才是力量。领袖们战略博弈的底气和根据，完全来自于他们背后军民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伟人史观、英雄史观，都必须让位于人民群众史观。没有他们便没有历史、没有自然界之外的一切。

在70年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和社会经济发展滞后几十年的代价，在悲愤与血泪中认识到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要性。我们回顾历史，无限缅怀为人类正义、人民福祉与世界和平而英勇奋战的各国反法西斯英烈们，同时，更要审视当今世界之风云变幻和周边威胁，警惕霸权主义势力和东方老战争策源地的新动向。世界各国无一不是拜谒英雄纪念碑，惟独日本政界要人却参拜战争罪犯灵牌。《开罗宣言》所确定的应该归还中国的领土中，至今钓鱼岛仍然被日本控制。就这个意义讲，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余孽的斗争还在继续。

李际均*

2016年3月12日

* 李际均，1934年出生，1950年入伍，曾任军事科学院学术调研处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4军71师师长、第38集团军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将军衔。国防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国政策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高级顾问，著有《中国军事战略思维》（2014年版），主编《中国军事通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

序 四

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主要国家领导人——“三巨头”的往来书信的确独树一帜：就其意义、模式、规模以及通信人的历史作用而言，在整个外交史上似乎无出其右者。书信是他们最主要的联络渠道，确保了他们在世界命运面临最危急的战争时期保持最直接的私人接触。在通信过程中，领导人不仅互通情报，而且就打击不共戴天之敌的立场和全局战略进行协调，甚至为了捍卫本国利益而进行激烈的争论。

众所周知，我国率先出版了著名的书信集。第一版书信集早在1957年就问世了。其中发生的奇特而非同寻常的故事鲜为人知。俄罗斯档案文件显示，1951年夏季到来之前，经И.В.斯大林本人同意、由В.М.莫洛托夫（Молотов В.М.）挂帅的外交部下属工作组起草的这个版本将付梓。工作进行得一丝不苟和尽心尽力，有几个事例可以佐证。第一，在战争年代，F.罗斯福和W.丘吉尔信函的所有文本都是在收到信后立即翻译出来的，在编纂过程中又重新对照英文原件进行了修订，新的译本由斯大林亲自过目，斯大林时而还在修辞上做些改动。第二，编者指出了斯大林信函中所谓的不妥之处，在冷战形势下，其可能会引起不同的解读。但在定稿时，所有这些最后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斯大林的信函也对照密码电报发送的原件进行了校对。此外，信函还修正了一些细小的语法疏忽，并征得了作者本人的同意。

这一版本原计划于1951年底印刷20万册，并计划将其译成8种文字，包括汉语。¹一切迹象表明，克里姆林宫要展开一场大张旗鼓的宣传战，以对抗西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阐释，对这段历史的不同解读在当时出版的英美活动家的回忆录中已初显端倪。由此看来，斯大林欲把信函视为自己巨大的政治资产，并试图将其作为与《历史的篡改者》进行斗争的武器，这场斗争以1948年发表的著名《历史参考资料》为发端，《历史篡改者》与《历史参考资料》为同一书名〔《Фольсификатор истории（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 справка) 》]。1951 年秋, 外交部所属内部印刷厂甚至印制了这个版本的试行数量。但不知何故, 这个版本被推迟发行, 可以推测出是斯大林本人的决定, 因为在 10 月份, 莫洛托夫通知外交部档案馆: “有指示, 暂推迟。”² 1955 年 3 月, 官复外交部长一职的莫洛托夫建议出版已完成的样本, 理由是, “信函可以还原我们在战时与盟国关系的真相”。另一个理由是, 西方发表了新版美英活动家回忆录, 以及雅尔塔会议 (Ялтин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的相关文件。这一次, 外交部建议缩减出版规模, 印刷 10 万册, 并译成英、法、德 3 种文字。但是,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推迟审议该问题, 可能是因为当时美国出版的雅尔塔会议文件更加真实全面, 要想与其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非常困难。³ 两年后, 新任外交部长 А. А. 葛罗米柯 (Громыко А. А.) 又试图让尘封的版本重见天日, 这次准备系列出版, 并为此专门成立了外交文件出版委员会, 隶属葛罗米柯掌印的外交部。⁴ 这个倡议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支持,⁵ 如果不考虑文集名称中的领导人著作权, 则这本历经磨难的著作终于以该委员会的名义于 1957 年秋首次问世。但国际版的“规模”被压缩, 只译成了英文一种文字。⁶ 即便如此, 该书出版后仍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连续再版, 并成为世界范围内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重要文选来源, 是“三巨头”往来书信的唯一全本。难怪冷战年代权威的西方评论家在看到首版之后也承认其翔实可信, 同时又不无遗憾地说, 它是在苏联出版的, 而不是在美国或者英国。⁷
- 7 美国国务院甚至对照本国原始档案特地审查了该书, 但也不得不沮丧地承认, 书中没有故意的歪曲或丑化。

然而, 这些书信的学术研究价值和使用价值远未穷尽。首先, 在过去这段时间里, 研究这一专题的文件保障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国和英国解密了一大批战时档案文件, 这使得能够依据第一手资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外交史进行仔细研究。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图书馆 [主要藏品为机要室卷宗、总统秘书处及其助理 Н. 霍普金斯 (Гопкинс Г.) 的文稿]、独立城 (密苏里) 的 Н. 杜鲁门 (Трумэн Г.) 图书馆、英国外交部 (Форин Офис) 和政府档案馆提供的文件资料以及位于剑桥的丘吉尔个人档案为开展这项工作提供了特别有益的帮助。这些文件被各国的历史学家积极使用, 但迄今为止, 无论在西方史学界, 还是在俄罗斯史学界, 尚无专门研究“三巨头”书信这一专题的成果。在直接与书信相关的文件发表方面, 早在 1980 年代中期,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 W. 金伯尔 (Кимбэлл. У) 就发表过基础性的三卷本罗斯福与丘吉尔往来书信, 还附加了详细的学术注释。⁸ 不久前, 美国发表了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往来书信, 以及丘吉尔与杜鲁门的往来书信, 还插入了一些浅白的

说明。⁹在声名显赫的丘吉尔传记作者M.吉尔伯特(Гилберт М.)的组织下,丘吉尔1942年(含1942年)之前的完整书稿基础出版工作至今仍在进行。¹⁰

迄今为止,对斯大林“这一角”的书信研究最为欠缺,尽管我国有很多与书信往来相关的档案文件也已解密。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收藏的斯大林手稿和其他工作资料,展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给盟国领导人写信时的相互协作,该馆收藏的有关莫洛托夫的资料也揭开了首版书信集准备过程的真相。近30多年来,我国发表了多个系列关于苏美关系史和苏英关系史的文件,以及战争年代苏联对外政策史文件,这些文件大大拓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史的资料来源,并被积极用于研究工作。¹¹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外交部领导的支持下,特地为该课题解密了大批外交政策档案,这些新解密文件主要内容是苏联驻伦敦和华盛顿大使对于往来信函的相关报告。俄联邦总统档案馆提供了一系列关于战争时期联盟关系史的有价值的新文件。作者历尽波折从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档案馆中收集了约5000份文件,其中许多是首次在学术界披露。这使得可以从三方不同的角度展现“三巨头”书信往来的历史背景,重塑独特而真实的历史场景。尽管本书有意识地将重点放在了第一手资料上,但在筹备工作中,广泛采用了国内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渐丰富的历史研究文献,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史文献。如果说早期的版本以简单的参考性注释为主,那么对新文件和历史资料的分析,则可以为书信提供更为详细的学术注脚,使得若干重要历史研究课题可以迎刃而解。

最直接的研究课题之一就是追踪考证信函出炉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莫斯科、华盛顿和伦敦不尽相同。斯大林主要依靠自己的第一助手、外交人民委员会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执笔。多年以后,在回忆起斯大林与“三巨头”中的另外两位通信时的情形时,莫洛托夫说:“有些书信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很多书信是我们共同起草的。但所有信函必须经过我的手,没有之一。”¹²共同“起草”的过程也采用过各种形式。人民委员有时会把他的助手А.Я.维辛斯基(Вышинский А.Я.)和В.Г.杰卡诺佐夫(Деканозов В.Г.)召来参与这项绝密工作。他们二位负责就一些次要问题起草书信。在某些重要情况下,莫洛托夫明显收到过“当家人”的口头指示,他会煞有介事地把事先写好的文本呈给“当家人”批复。无论哪种情况,人民委员签名的所有草稿都要“呈斯大林同志审批”,批语多为“同意”或“修改后同意”。斯大林有时会整段地补充,偶尔会亲笔书写全文。通过与斯大林多年的密切接触,这位《真理报》主编出身的莫洛托夫凭借丰富的经验,已经娴熟地掌握了斯大林的思维方式

和修辞习惯，即便如此，莫洛托夫起草的书信有时也逃不过严苛的“苏联国家总编辑”的认真修改，后者改过的地方在著作中总能显示出深思熟虑和一丝不苟。

同是在这方面，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助手要多得多，他们自己，特别是罗斯福，极少参与文本的起草。总的来说，斯大林本人对“三巨头”往来书信的参与度比罗斯福要高，亲手执笔比丘吉尔要多。丘吉尔要依赖外交部和参谋长委员会提供的草稿，以及内阁的指南。战争临近结束时，“三巨头”中丘吉尔信函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他的私人秘书J.科维尔（Колвилл Дж.）写道：“在浏览首相签名的书信时，我常想，未来的历史学家要有火眼金睛才能区分丘吉尔的‘真迹’和他‘写作班子’的信函，我们都成了丘吉尔个人风格最好的模仿者，尽管他的发言和他的绝大部分书面指示一样，都出自其本人之手，然而，他的大部分信函却并非如此。”¹³尽管根据保留的档案厘清信函的真正作者尚存诸多困难，但除了进行纯技术性的档案考察外，还要辨别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和思维方式。有趣的是分析领导人在助手们起草的信函上所作的修改，因为修改之处最能反映每位领导人的个性。丘吉尔的手迹明显有形象的文学风格，思想自由飞翔，这是大文豪和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所与生俱来的。罗斯福的信函则带有官方色彩和平淡无奇，而他的个人介入部分由于不同部门的参与起草，时而会冒出一些美国式的外交辞令或纯军事色彩的语言。斯大林的语言枯燥，表达特别具体和准确，总是直抵所讨论问题的本质。与惯于使用民主句式的西方伙伴不同，斯大林擅长使用意识形态用语，而且极少使用夸夸其谈的表达。

10 对于他们三位来说，往来书信首先是讨论具体的现实问题的工具，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回顾。罗斯福身边的工作人员证实，罗斯福曾打算卸任后写回忆录。¹⁴丘吉尔凭借其对历史文学的酷爱，早在战争时期就计划把这些往来信件写进自己未来的回忆录。在1944年1月未发出的致斯大林的信函中，他建议保留自己与克里姆林宫领袖之间的分歧，待由历史评说，但同时也不忘提醒，他“打算亲笔书写历史”。¹⁵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的鸿篇巨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斯大林的往来书信成为该书的中心内容。斯大林不想写回忆录，但又不愿忽略自己的历史地位，包括自己与伟大的西方民主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早在1944年12月，在与C.戴高乐（Голл Ш.де）会谈时，他就提到过将来可以发表他与丘吉尔的往来书信一事。¹⁶这一情况迫使“三巨头”在对待自己的信函时格外认真。

就书信的保密性和个性特点来说，苏联方面首屈一指。苏联信函的内容